

名稱·文獻·方法

——“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張伯偉

(南京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3)



[摘要]從高麗時代直至朝鮮時代末期的六百多年時間中，到中國的使團中有不少人留下了使行記錄；據估計，其總數當在七百種以上。這些資料之受到韓國、日本和中國海峽兩岸學者的日益重視，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如何看待及使用這些文獻，尚存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待各國學者通過較為細緻的討論，纔能夠取得共識，以期更好地利用。其一是“名稱”問題。現代學者在整理和使用這些文獻時，以“燕行錄”之稱最為流行，但這不是一個合適的稱謂，應當予以更改。在明代，朝鮮使臣稱此類文獻多以“朝天”命名；明清鼎革之後，以“燕行”為書

名者比比皆是。兩者皆充滿政治意味。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使用這些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稱謂都是不合適的，合適的名稱是“中國行紀”。這是一個較為中性、客觀的用語，適合於在學術討論中加以運用；而且，追根溯源，此類文獻之祖就是以“行紀”命名的；同時，“行紀”也是現代學術研究中使用的共名。其二是文獻中的問題。其中含有兩類，一在文獻整理，一屬文獻本身。從後者來看，其問題包括雷同、抄襲。以存世卷帙最富的舊題徐有素《燕行錄》十六卷為例，其中在作者、撰著時間、轉抄以及文獻來源等方面存在大量問題。其三是研究方法的問題。就各國的行紀文獻而言，其中所提供的記錄是新鮮而生動的。這一方面可以讓讀者真切感觸到一幕幕歷史場景，但也有引導研究者墜入某個無關宏旨的片段的危險。因此，研究者更加需要有整體視野，也更需要以“漢文化圈”為方法。

[關鍵詞]燕行錄 中國行紀 文獻 抄襲 方法 漢文化圈

[作者簡介]張伯偉(1959—)，男，上海市人，1982、1984、1989年在南京大學分別取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客座教授(2000—2001)、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2004)、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教授(2007—2008)、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2011)，現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詩學、域外漢籍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詩格彙考》、《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東亞漢籍研究論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主編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國詩學》、《中華大典·文學理論分典》、《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等。

Name · Literature · Metho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n “Yan Xing Lu”

Zhang Bowei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93)

Abstract: From Koryo era to the late of Joseon era (over six hundred years), records about the envoys visiting China were estimated to be over 700 kinds in total, which has been obviously gaining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of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os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owever, the attitudes on these materials and the usage methods are crucial, which shall be discussed by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 and using them in a better wa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aises three issues for discussion, which are “Name”, “Literature” and “Method”. In talking about the “name”, while collating and using these literatures, most modern scholars will adopt the name of “Yan Xing Lu” (Yanjing Tour Record), which is inappropriate and shall be changed. In the Ming dynasty, envoys in Joseon named such literatures as “worshipping the emperor”, while in th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 books were named “Yan Xing”; both of which are full of political complexion and improper for academic research. Therefore the proper name shall be “China Tour Record”, which is neutral and objective and can be used during academic discussion. In addition, these literatures were merely named after “tour record” in nature, and tour record is the common name used in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Secondly, in regard of “Literature”: it includes colla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itself, and the latter is the key issue to be discussed here, which covers similarity and plagiaris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Yan Xing Lu* (Volume XVI) of Xu Yousu, the most abundant volumes, as an example,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author, writing time, plagiarism and literature source of *Yan Xing Lu*, which draws the attention of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Lastly the “Method” is discussed. Compared with the tour records of other countries, the records listed in the book are fresh and vivid, which can help us contact historical scenes clear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lead researchers sink into certain fragments not related to the keynote. Therefore, we are in need of an integral view and rely on “Chinese Culture Circle”.

Keywords: *Yan Xing Lu*; China Tour Record; literature; plagiarism; method; Chinese Culture Circle

Author: Zhang Bowei earned his bachelor, master and doctoral degree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2, 1984 and 1989 respectively. He had been the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in Kyoto University (2000—2001), Chinese Department of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3—2004),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2008) and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At present, he is the director, chair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the vice-chairma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stitute. He is primarily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n Chinese poetics and Asian classics in Chines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Study on Critical Method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Shige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rief Discussion on Eastward Spread of Poetry Theory in Qing Dynasty*,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East Asia*, *Chinese Culture Circle as Method* and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Asian Classics*, etc.

從高麗時代直至朝鮮時代末期的六百多年時間裏，到中國的使團中有不少人留下了使行記錄；據估計，其文獻總數當在七百種以上。關於這類文獻，最早是由韓國學者開始重視整理的，迄今為止，已出版若干種大型叢書。如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1960—1962）、《燕行錄選集補遺》（2008），民族文化推進會（今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國譯燕行錄選集》（1976—1982），林基中教授編《燕行錄全集》（2001）、《燕行錄續集》（2008），林基中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

和日本夫馬進教授合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2001）等。2013年，韓國又推出了光盤版林基中編《燕行錄叢刊》，收錄作品四百五十五種。2014年，再次推出《增補燕行錄叢刊》，數量增加到五百五十六種。在中國海峽兩岸，珪庭出版社（臺灣）出版了《朝天錄》（197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燕行錄全編》（2010年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2011）。在這些資料受到韓國、日本和中國海峽兩岸學者日益重視的同時，如何看待及使用這些文獻則存在一些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本文擬拈出三方面自覺重要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意見，供大家批評或參考。

一、“名稱”的問題

從高麗時代末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朝鮮時代的終結，朝鮮半島到中國的使團絡繹不絕，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往返途中及歸國之後有不少記錄，在明代的時候常常以“朝天錄”命名，到清代則易之以“燕行錄”。現代學者在整理和使用這些文獻時，對其總體稱謂也以“燕行錄”最為流行，有的甚至還擴大到稱呼其他國家人員到中國的使行記錄文獻。^①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別的稱謂，祇是並不通行。^②

“燕行錄”之稱雖然流行，也為學術界所熟悉，但這並不是一個合適的稱謂，應當予以更改。原因在於，朝鮮半島與中國的交往，由來已久。其間始末，洪敬謨《燕棗彙苑總敘》所言頗具概括性：

朝鮮，東海小國也。建國肇自檀君，遣使通中國又自其時……箕子代檀氏以王，白馬朝周，亦載於史……自三韓之時至羅、濟之初，皆詣樂浪、帶方二郡貢獻，而未嘗達於中國……至晉唐南北朝時，百濟始遣使……而皆非歲以為常者也。及夫高麗統三為一，傳國五百，南事宋而北事契丹，又事金、元。程里最近於諸國，故比年一聘……暨我本朝與皇明並立，而皇都在金陵，故航海而朝天。成祖皇帝之移都於燕京也，乃由旱路歷遼東，穿山海關而入皇城，蓋自我太宗朝己丑始也。皇朝，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崇禎甲申，清人入主中國，我以畏天之故，含忍而又事之如皇

① 目前已出版的各種大型相關文獻整理，無論是韓國還是中國海峽兩岸，都以“燕行錄”（偶爾用“朝天錄”）來統稱，甚至把越南的中國行紀文獻也冠以“燕行”之稱。而實際上，越南使臣的記錄多以“北行”為名，或至廣州，或至天津，或至北京。

② 比如，張存武在《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收入《韓國史學論叢》，首爾：探求堂，1992）中提倡使用“華行錄”之稱，因為在朝鮮時代末期，確有少數記錄就是以“華行”為名。徐東日《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把這些文獻冠以“使華錄”之名。又，楊雨雷在《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一書中也偶爾用過“入華行紀”之稱，但又特別說明：“本文在總稱上基本採用學術界熟悉的‘燕行錄’之稱。”

明，今且為二百年。^①

使行文獻的出現，亦始於高麗而大盛於朝鮮朝，這與兩國之間的來往頻繁是密切相關的。明代初年，“皇都在金陵，故航海而朝天”；明成祖遷都燕京，故自太宗九年（1409）也改由遼東入燕。當時的使行文獻，雖然有少數以“燕行”為題名者，但多數的稱謂仍然是“朝天”。即使用“燕”，也仍然懷有“朝天”般的感情，如李民成萬曆年間撰《題壬寅朝天錄後》云：“燕今為天子之邑，四方之取極者於是，九夷八蠻之會同者於是，其宮室之壯，文物之盛，固非前代之可擬，斯亦偉矣！”^②明清鼎革之後，以“燕行”為書名者比比皆是，幾乎看不到“朝天”之名。這種帶有整體性的名稱改換不是偶然現象，其背後是一種文化觀念在支撐。即便就其中唯一的例外——張錫駿在同治三年（1864）出使清朝的《朝天日記》而言，若結合其《春臯遺稿》中《朝天時驢行諸篇》一併閱讀，就可以發現，其所謂的“朝天”，還是以“有明遺臣”^③自居，去到“皇明先帝舊城壕”^④，繼承的是大明“三百年朝天之行”^⑤的傳統。送行者甚至有這樣的期待：

吾聞皇明之遺民，往往混跡於屠沽之間，而多感慨悲歌之士。吾子其彷徨察識於眉睫之間而得其人，因執策而語之曰：今天下貿貿焉皆入於腥穢氈裘之俗，而惟吾東國獨保皇明禮樂之教，祀而崇大報壇，花而種大明紅，紀年而先揭崇禎號。天王之一脈王春，獨在於檀箕故國我后之朝鮮矣。^⑥

而對於作者來說，此行最大遺憾，乃“不得與皇明古家遺裔吐筆舌、敘感慨、唱黍離、吊故都”^⑦。所以，書名中的“朝天”並非對清王朝的認可，而是對大明故國的懷念。

毫無疑問，“朝天”的名稱含有“事大之誠”的觀念，這幾乎是高麗朝以來君臣上下對中國皇帝信誓旦旦的“口頭禪”，其含有濃厚的政治意味是極為明顯的。“燕行”雖然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地理方位的指向，但在明清之際由“朝天”向“燕行”的整體轉變中，它一方面代表了朝鮮士大夫對清朝“含忍而又事之”的無奈（如鄭太和有《飲冰錄》、蔡濟恭有《含忍錄》），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他們對清王朝的鄙夷，認為這個政權不配被稱作“天朝”。特別是在將“燕行”與“朝天”對比的時候，這種觀念表現得尤為突出。茲列舉若干材料如下：

李夏鎮《燕山述懷》：“朝天舊路行行愧，不是當年玉帛將。”^⑧李敏敘《送沈可晦赴燕》：“此路朝天前日事，遺民思漢至今悲。”^⑨柳尚運《燕行錄·呈正使案下》：“今行非復朝天路，隨遇空為感舊吟。”^⑩崔錫鼎《送李參判光佐赴燕》：“昔我銜王命，十年再赴燕。衣冠今變夏，槎路舊朝天。”^⑪宋相琦《送冬至副使趙令錫五》：“莫說烏蠻館，生憎鴨水船。北來唯古月，西去豈朝天？”^⑫申光洙《洪君平（名漢）燕槎續詠序》：

不佞觀國朝前輩朝天詩多矣，方皇朝全盛時，赴京者多名公卿，與中國學士大夫揖讓上下，富禮樂文章之觀，故其詩率忠厚和平，有泠泠之音。左衽以來，入燕者徒

① 《韓國文集叢刊·冠嶽全書》（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續第113冊，第336頁。

② 《韓國文集叢刊·敬亭集續集》（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第76冊，第523頁。

③ [朝]張錫駿：“朝天日記”十二月十二日，《春臯遺稿》（首爾：韓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卷1。

④ “李能變贈詩”，《春臯遺稿》卷1。

⑤ “柳致任贈序”，《春臯遺稿》卷1。

⑥ “李宗淵贈序”，《春臯遺稿》卷1。

⑦ [朝]張錫駿：“朝天日記跋”，《春臯遺稿》卷1。

⑧ 《韓國文集叢刊·六寓堂遺稿》（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7），續第39冊，第68頁。

⑨ 《韓國文集叢刊·西河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第144冊，第61頁。

⑩ 《韓國文集叢刊·約齋集》（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7），續第42冊，第442頁。

⑪ 《韓國文集叢刊·明谷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第153冊，第547頁。

⑫ 《韓國文集叢刊·玉吾齋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第171冊，第301頁。

見其休僣^①醜之俗，如皇極之殿，石鼓之經，辱諸腥穢，故其詩皆黍離也。所謂金台易水、漸離荊卿之跡，不過借為吾彷徨躑躅之地，人人而有悲憤不平之音……聞單于近益荒淫，或者天厭其穢，真主復作，君平奉國命入朝，睹中華文物之盛，雍容東歸，則於是乎又必有朝天錄，不佞願一寓目焉。^②

從這樣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朝天”或屬於往日的美好，或寄寓他日的期待，“燕行”則透露出當下的悲憤，甚至把清代皇帝稱作“單于”。所以，由“朝天”轉變為“燕行”，絕不僅僅是指代一個地理方位，而是充滿了政治意味和文化立場的特殊名稱。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言，使用這些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稱謂，無論是“朝天”還是“燕行”，都是不合適的。

我認為，合適的名稱是“中國行紀”。1998年8月，我寫過一篇《韓國歷代詩學文獻綜述》，收在《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中，列舉了七類書籍中的相關文獻，其中之一為“行紀”，指的就是以“朝天錄”或“燕行錄”等題名的著作。前幾年，我在《域外漢籍研究入門》^③中對這個問題又有所論及，明確主張以“中國行紀”來命名域外人士出使中國的記錄文獻。以“行紀”來概括此類文獻，更早的有日本學者中村榮孝（1890—1963），曾發表《事大紀行目錄》^④，著錄了朝鮮時代赴中國的使行記錄；雖然遠遠談不上完備，但畢竟是最早注意並網羅及此者。祇是在“紀行”前冠以“事大”一詞，還是帶有較為濃厚的政治色彩。

我提倡使用“中國行紀”來概括此類文獻，理由有三：第一，這是一個較為中性、客觀的用語，適合於在學術討論中加以運用。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理由，即追根溯源，此類文獻之祖就是以“行紀”命名的。第三，“行紀”是現代學術研究中使用的共名。第一個理由無需解釋，第三個理由也比較簡單，以下主要就第二點略陳己見。

古代天子為“周知天下之故”，就規定了執掌邦國外交的“小行人”職責，其中之一就是製作“五書”。賈公彥概括道：“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為一書，以報上也。”^⑤孫詒讓則說：“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⑥可見，當時已有使者將其見聞撰著成書的制度。現在所能知道最早的相關文獻，是西漢陸賈所寫《南越行紀》（一名《南中行紀》），但當時尚無定名。南北朝時，此類著述開始增多，書名也多以“記”或“行記”為題，以李德輝《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為例，如《東夷諸國行記》、《董琬行記》、《南海行記》、《封君義行記》、《江表行記》等。既有在國內的，也有去國外的。同時，也有不少僧人的著作，所謂“自漢之梁，紀歷彌遠”，“衆家記錄，敘載各異”，其中就有“止命游方一科”^⑦者，如《佛國記》、《宋雲行記》等。到了唐宋時代，由於中外交通日益頻繁，這類文獻也大量湧現。李德輝根據作者身份區分為四大流別，即外國使臣行記、僧人行記、文臣行記以及彙纂類行記。據他的統計，宋人撰寫的外國行記多達五十六種，國內行役記也有二十四種。在寫法上，自中唐開始，就有人改換過去以行程為單位的記事，變為日程敘事法，如李翱的《來南錄》，至宋代更為普遍。^⑧其內容繁雜，寫法不一；所以，歷代目錄學上的歸類也很不一致。多數歸入史部地理類，但也有較為複雜的狀況，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就分別歸入偽史類、

① 原文誤作“僣”，茲以意改之。

② 《韓國文集叢刊·石北集》（首爾：景仁文化社，2001），第231冊，第482頁。

③ 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④ [日]中村榮孝：《事大紀行目錄》，《青丘學叢》1(1930)。

⑤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上冊，第894頁。

⑥ [清]孫詒讓：《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3007頁。

⑦ 《高僧傳序錄》（北京：中華書局，1992），湯用彤校注，第523頁。

⑧ 李德輝：“前言”，《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第1—20頁。

雜史類、傳記類、地理類；《宋史·藝文志》則除了歸入史部故事類、傳記類、地理類外，還有歸入子部小說類者。

宋代以來，有一類行紀以“語錄”為名，如寇瑊《生辰國信語錄》、富弼《富文忠入國語錄》、劉敞《使北語錄》等。有的學者主張以“語錄”來概括所有的使行記錄文獻^①，我不大贊成。使行文獻中的“錄”，多為“記錄”之“錄”，當然既可記行，也可記事，還可記言。此外，語錄的含義較為豐富，有禪宗之語錄，有儒門之語錄；有詩話而名語錄者，有筆記而名語錄者；所以，不如“行紀”來得單純明瞭。

宋代還有一類行記，是以“日記”、“日錄”為名，如周必大《歸廬陵日記》、樓鑰《北行日錄》等，明代賀復徵對日記的定義是：“逐日所書，隨意命筆，正以瑣屑畢備為妙。”^②而他追溯日記體的淵源，認為“始於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③，直接與行記聯繫在一起，至少表明“日記”是“行記”之一流。在朝鮮時代的行紀文獻中，也有如張子忠《判書公朝天日記》、蘇巡《葆真堂日記》、鄭崑壽《赴京日錄》、金海一《燕行日記》、韓泰東《燕行日錄》等，可見此類命名方式頗為常見。但日記的內容極廣，“政治家議朝政，出使者記行程，遣戍者敘貶謫，典試者談科場，旅遊者述行蹤，隨征者載戰況”^④，而朝鮮時代也有大量以“日錄”為名，而實與行紀無關者，所以，也不宜採用為行紀類文獻的通名。

雖然在唐代的時候，就有中國學者對新羅有所記載，如顧愔《新羅國記》，但真正與朝鮮半島文臣有所互動，實自宋代始。如北宋淳化四年（993）陳靖一行有《使高麗記》，宣和五年（1123）徐兢出使高麗而有《使高麗錄》。反之，金富軾於靖康元年（高麗仁宗四年，1126）“如宋賀登極”^⑤，便撰有《奉使語錄》，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可見其與宋代行紀文獻的淵源。^⑥

考察朝鮮時代的“朝天”、“燕行”文獻，其命名方式與中國唐宋時代的行紀亦多一脈相承。除上文提及者外，還有以“奉使”為名者，如宋代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姚憲《乾道奉使錄》，朝鮮權近《奉使錄》；有以“于役”為名者，如宋代歐陽修《于役志》，朝鮮金允植《析津于役集》；有“道里記”、“行程錄”，如唐代程士章《西域道里記》、宋代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朝鮮申欽《甲午朝天路程》、李基敬《飲冰行程曆》，等等。此外，如朝鮮時代崔演《西征錄》、李夏鎮《北征錄》、魚允中《西征記》，也都可以在中國的行紀文獻中找到類似的題目。有的則直接以“紀行”（即“行紀”）名之，如麟坪大君《燕途紀行》、李魯春《北燕紀行》、洪良浩《燕雲紀行》、鄭昌聖《燕槎紀行》、安光默《滄槎紀行》等。有些書不以“紀行”為名，往往也要作出說明，如曹偉《三魁先生觀光錄序》云：“觀光者何？觀上國之光也。不曰‘紀行錄’而曰‘觀光’者，重上國也。”^⑦又如徐慶



1860年代的“燕行使”

①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28頁。

②③ 《文淵閣四庫全書·文章辨體彙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5），卷637、639。

④ 陳左高：《緒言》，《中國日記史略》（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第1頁。

⑤ [朝]金宗瑞：《高麗史節要》（首爾：明文堂影印本，1981），第213頁。

⑥ 據《高麗史·列傳·金富軾傳》（首爾：亞細亞文化社影印本，1983）載：“宋使路允迪來，富軾為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為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肩鑣板以廣其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可知金富軾與徐兢《高麗圖經》（含《使高麗錄》）的關係，其《奉使語錄》也很可能受到徐兢的啟發和影響。

⑦ 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丙辰觀光錄》（首爾：尚書院，2008），第101冊，第112頁。

淳《夢經堂日史序》云：“曷謂之日史？紀行也。曷行？燕行也。”^①總之，朝鮮時代的此類文獻，其命名方式雖然是多種多樣，但以“行紀”為總名最為合適。18世紀朝鮮鄭昌順等人所編《同文彙考》，其《補編》部分涉及此類文獻，以“使行錄”名之，與“行紀”的意思是接近的。

用“行紀”概指此類文獻，其實是現代學術史上的共名，也是我主張使用的第三點理由。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就寫有《古行記校注》^②一書。80年代，有楊建新主編之《古西行記選注》^③。近年來，有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④。陳佳榮、錢江、張廣達合編之《歷代中外行紀》^⑤，也收錄了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相關文獻。李德輝則出版了《晉唐兩宋行記輯校》。日本僧人圓仁在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入唐，撰寫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行紀》並列為“東方三大旅行記”，其書也以“行紀”名之。因此，以“行紀”為名，便可將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乃至西洋的相關文獻賦予一個適當的總稱，這在學術研究上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二、文獻中的問題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燕行錄選集》為代表，這類行紀文獻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除了《國譯燕行錄選集》附有現代韓文翻譯和索引外，絕大部分工作還停留在影印舊籍的層面，整理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對於其中的文獻問題，多數學者也是就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林基中所編《燕行錄全集》）中出現的訛誤加以更正，如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⑥、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⑦；祇有少數文章在涉及整理者問題的同時，研究了此類文獻本身的問題，如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⑧這裏準備探討的，也是有關這些文獻本身的問題。

朝鮮半島的中國行紀文獻，擁有五百年不間斷的撰寫歷史，其價值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但這類文獻本身存在的問題也需要指出，這樣纔能更為有效地加以利用。

第一個問題是雷同。傅樂煥將宋人的行紀文獻皆歸入“語錄”，他在《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中指出：

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錄》上之於政府。《語錄》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廷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帶記載着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使臣年年派遣，《語錄》自也不斷地出現，因此當時的人對於這種同時人的記載，習以為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別地重視。^⑨

這類“官樣文章”並非中國所特有，在朝鮮時代的外交使行中，使臣回國後，也照例要向國王報告，類似情形也正多見。例如，崔暉《朝天日錄》九月初八日末“書啓”云：“為聞見事，臣跟同上使臣申滌、副使臣尹暘前赴京師，竣事回還，凡所見聞，逐日開坐。”^⑩又如，洪翼漢《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卷末云：“為聞見事，臣跟同臣使李德洞、吳翻，前赴京師，今已竣事回還，一路聞見，逐日開坐。為此謹具啓聞。”^⑪再如，李永得《燕行

①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第94冊，第154頁。

② 王國維：《古行記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③ 楊建新主編：《古西行記選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

④ 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

⑤ 陳佳榮、錢江、張廣達編：《歷代中外行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⑥ 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張伯偉編，第4輯。

⑦ 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中國學論叢》（首爾：高麗大學，2008），第24輯。

⑧ [日]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京都：京都大學，2003），第42號。

⑨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第1—2頁。

⑩ 《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上冊，第10頁。

⑪ 《燕行錄全集》，第17冊，第322頁。

雜錄·內篇·入彼地行中諸般事例》云：“使臣還……書狀與首譯各修聞見事件（彼中政令及異聞異見略錄之），覆命時納於承政院。”^①直到張錫駿《朝天日記》卷末云：“即日詣闕，奉納彼地聞見錄與日記。”^②因此，這也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

朝鮮使臣到北京，其途程大致有三條：第一，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鞍山、耿家莊、牛家莊、盤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第二，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奉天、鞍山、耿家莊、牛家莊、盤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第三，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奉天、孤家子、白旗堡、小黑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這些路綫由中國指定，朝方不能隨意變更。由於途程相似，後來者又往往閱讀以往記錄，除少數人有考證癖，或可糾正前人之謬，多數乃沿襲舊談，所以難免雷同。這一類文獻中最具特色者，金景善《燕轅直指序》曾有如下概括：

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則金近於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朴類夫立傳而瞻麗闊博。^③

具體所指，即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湛軒燕記》和朴趾源《熱河日記》，而他自己“則就準於三家各取其一體，即稼齋之日繫月、月繫年也；湛軒之即事而備本末也；燕巖之間以己意立論也”^④。但具有這種明確的文體意識者畢竟不多，所以這幾家行紀也就特別值得重視。

第二個問題是抄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雷同的表現之一。有的是明引，有的是暗襲。徵引有明確表示，容易辨認，但其中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崔德中《燕行錄》、李海應《薊山紀程》、金景善《燕轅直指》，都引用了《荷谷朝天錄》，但並非照原書抄錄。《老稼齋燕行日記·表諮文呈納》載：

舊例：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出《荷谷朝天錄》）。今則尚書（或侍郎）與郎中具服，面南立於大廳，大通官引三使奉表諮文跪進，郎中受，安於卓子上，通官引使以退。^⑤

這段文字祇是對於《荷谷朝天記》八月初九日所記在北京向明廷上呈國王諮文過程的概括，原文較繁，此處極為精簡。“今則尚書”以下，乃金昌業語，以作古今對比。我們再看崔德中《燕行錄·表諮文呈納》：

舊例：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出《荷谷朝天錄》）。今則尚書（或侍郎）與郎中具公服，面南立於大廳，大通官引三使奉表諮文跪進，郎中受，安於卓子上，通官引使以退。^⑥

雖然其中的“舊例”也注明了“出《荷谷朝天錄》”，但與其說崔德中本於許筠，不如說他直接取自金昌業。而“今則尚書”以下也全同於金書，顯然是直接抄錄自《老稼齋燕行日記》。

① 《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50—51頁。此書舊題徐有素《燕行錄》，實誤，考訂見下文。

② 《春阜遺稿》卷1。

③④ 《燕行錄全集》，第70冊，第246、247頁。

⑤ 《燕行錄全集》，第32冊，第309頁。

⑥ 《燕行錄全集》，第39冊，第400—401頁。

又，《燕轅直指·禮部呈表諮記》載：

《荷谷朝天錄》曰：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云。^①

儘管這段文字首先冠以《荷谷朝天錄》，但我們也不能認為它是從許筠書中直接引用，顯然抄自金昌業或崔德中。

再看一例，《老稼齋燕行日記·入京下程》載：

舊例：祇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餅，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蓼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②

再看許筠原文，《朝天記》中八月初八日記：

光祿寺珍羞署送下程錢糧：白米一石八斗，酒九十瓶，葉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香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蓼十五斤。凡此物件，五日送一次，循舊例也。^③

又八月初九日記：“光祿寺大官署送豬肉三十六斤，亦五日一次之例也。”^④可見金昌業是縮合了許筠兩天的日記拼為一則，也不是原文照錄。“順治以後”云云，乃金氏對比今昔之語。再看崔德中的記錄，《燕行錄·入京下程》載：

舊例：祇自光祿寺送米壹石捌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蓼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⑤

又，《燕轅直指·留館錄·留館下程記》載：

《荷谷朝天錄》曰：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蓼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云。而順治以後，自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⑥

又，《薊山紀程·食例》載：

舊例：凡於入京日，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⑦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菜蓼十五斤等物，間五日一給（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⑧

這幾段文字，除了個別的訛誤差異外，基本一致，顯然同出一源。但無論是以“《荷谷朝天錄》”引起，還是注明“出《荷谷朝天錄》”，其實都不是根據原書，而是本於《老稼齋燕行日記》，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沒有對這種情況有所說明。此外，如“鴻臚寺演儀”、“朝參儀”等條也存在類似情況。這就不難看出，行紀文獻的前後因襲是頗為常見的。

現存卷帙最富的行紀文獻是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錄》十六卷，收錄在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9—84冊，但此書中的問題頗多，也較為典型，值得作一綜合討論。

首先是作者問題。徐有素為朝鮮純祖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年，1822）十月冬至謝恩使團書狀官，此行正使為金魯敬，副使金啓溫，在本年十月二十日從漢城出發，十一月二十

①⑥ 《燕行錄全集》，第71冊，第172—173、218頁。

② 《燕行錄全集》，第32冊，第306頁。

③④ 《燕行錄全集》，第6冊，第223、228頁。

⑤ 《燕行錄全集》，第39冊，第399頁。

⑦ 原文誤作“升”，茲以意改之。下一字同。

⑧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483—484頁。

五日渡鴨綠江，十二月二十四日抵達北京，翌年二月初四離京返回，三月十七日入漢城。《燕行錄全集》題作徐有素，生卒年不詳。今案此書“三使以下渡江人員”記錄：“書狀官徐有素，字公質，號冷泉，乙未生，假銜執義。”^①可知他生於英祖五十一年（1775），但重要的是他並非作者。該書開篇即云：“壬午冬，余從使者作燕行……沿路所見、留館時遊覽者並錄如左云。”^②書狀官為“三使”之一，作者既云“從使者”，則其本人非使者可知。抵京後入住玉河館，記錄各人住所，“大廳之北為上房，正堂五間，有東西二炕，東炕上使處之。……上房之北為副房，屋宇規模與上房同，正堂東炕副使處之。……副堂之北為三房，正堂七間，西二炕書狀處之”^③。三使隨員住所亦多從之，如上房軍官、日官、譯官、乾糧官、寫字官住上使之左右前後，副房亦然。書狀官隨從有三：軍官李擧、伴倘李永得、乾糧官尹鴻德。其中，尹鴻德與上房軍官金振鏞同住上房之西廊南炕，作者乃與李擧住三房之東一炕。既同住一室，則地位相當。三房隨從中其他兩人名字皆已出現，則本書作者當為伴倘李永得。書名根據目次及正文，當作《燕行雜錄》，分內外篇，內篇自卷一至卷十二，卷十三以下為外篇。又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題名金魯敬《燕行雜錄》十六卷，與此書內容一致，但其撰者題名亦同樣有誤。

其次是撰著時間。《燕行錄全集》、《燕行錄叢刊》繫於1822、1823年，從部分意義上說是對的。開篇云“壬午冬”，卷六《日記》部分以純祖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日辛酉始，至卷八純祖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終，以公元計算，就是1822年到1823年。但《燕行雜錄》全書共十六卷（冊），卻並非成於一時。此書卷帙豐富，但除卷六至卷八為日記，出於作者之手，卷一、卷二間有撰作外，其餘則抄襲他書而成。抄襲者是作者本人，還是另有其人，暫時無法確認。但全書形成目前的狀態，最早也要在李太王十三年（清光緒二年，1876）之後，晚於《日記》五十多年。試看卷十三《燕行雜錄》外篇“外國”，首列日本，其中的“日本世系”最後一位“今天皇”，即明治天皇下記載：

明治六年癸酉一月一日，以神武帝即位之年為紀元，因置紀元節，自神武紀元之年至此，凡二千五百三十三年。○三月，令許與外人婚。天皇斷髮，王后落黛。○明治九年，遣黑田清隆、井上馨等通好，更定《修好條規》，日人留朝鮮。^④

明治九年為李太王十三年，既然已經出現這一歷史記載，則記載時間必然在此之後，抄錄時間也就更晚。因此，以1823年作為該書編纂之年，從整體上看，祇能說是錯誤的。

至於該書的抄襲問題，其來源則既有中國書，也有朝鮮書。經考察，卷一從“天下星曆夏至晝時刻”到“天下疆域”前，卷二從“測候”到“銓政官考”，皆抄自《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卷三從“燕京天文”到卷五，抄自清人吳長元《宸垣識略》。卷九至卷十二“歷代疆域”，抄自明陸應陽輯、清蔡方炳增輯之《廣輿記》。卷十三“日本”，分別抄自朝鮮南龍翼《聞見別錄》、姜沆《看羊錄》、申維翰《海槎東遊錄》和《海遊聞見雜錄》。卷十四“合國”（包括安南、琉球等）抄自《廣輿記》。卷十五“燕都雜詠”和卷十六“燕都記聞”抄自《宸垣識略》。卷十六“明清文評”則抄自《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種抄襲堪稱連篇累牘，如果誤作他本人的撰著，勢必影響正確的學術判斷。

就抄襲方式來說，也分各種不同情況。有的是節抄，如“燕京天文”之於《宸垣識略》；有的是照抄，如“明清文評”之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的是雜抄，如“燕都雜詠”之於《宸垣識略》。此外，在抄錄過程中，他也是有增有減，增加者頗能顯出其主

①② 《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24、246頁。

③ 《燕行錄全集》，第81冊，第75—76頁。

④ 《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259頁。

觀感情。例如“日本”部分抄錄了《海遊聞見雜錄》中的話：

諸松前守看管之地，惡不可居，人皆面黑有毛，不識文字，蠢軟愚迷，便同禽獸。日本人皆不齒於人類。^①

校以申維翰之原著，其中“蠢軟愚迷”、“日本人皆不齒於人類”二語，即為抄錄者所增加的議論。若與其他部分相比較，作者對於中國與日本的不同觀感和態度是顯然的。如卷一“人物風俗”載：

所至見滿人，其衣服外樣，皆非貧窶者，且其人身長貌偉，個個健壯。人品仁善平坦，多率性徑情，少陰鷲邪曲，待人恩厚款曲，處物慈諒平善。蓋其天性本然，而又其習俗使之然也。^②

朝鮮人對於滿人素無好感，這樣的記載是罕見的。又“禮貌”載：

中國人規模大抵多恭謹，少倨傲。滿人始見若偃蹇驕亢，及與接話，則其恭過於漢人。……余輩欲見彼中人士，至其家，使馬頭修刺（彼俗訪人必修刺，不遇則留刺焉），則無不出迎，或出戶，或降階，或至外門，位高者皆然。^③

又“言語”云：

中國言語，即所謂漢語也。中國人雖目不識丁之類，其言語則無非文字，可謂發言成章。^④

以上從身樣性情、禮貌習俗、語言文字三方面看，皆足以與日本作對比。故抄錄者所增添數語，無不顯示其貶抑之情。

日本部分“倭皇世系”天頭空白處有不知何人之校語，每有“原本云”，揭示異同，共十二則。所謂“原本”，當指南龍翼《聞見別錄》。可惜其校勘亦極為簡略，不甚注意其異同。例如，“後圓融院”下“丁亥，高麗使鄭圃隱來”，鄭夢周奉使日本在高麗辛禡三年（明太祖洪武十年丁巳），原本正作“丁巳”，“丁亥”誤；“仙洞院”下舉甲子（1624）朝鮮通信使名字，有“鄭弘重”者，亦為“姜弘重”之誤。自“後西院”以下共五天皇，南氏不及載，乃別有所本。

在卷七的日記部分，作者於癸未正月十一日曾記錄了在北京琉璃廠文盛堂書肆遭遇的一幕：

鋪主出一冊示之，名曰《簡明目錄》，即乾隆所編輯《四庫全書目錄》也，其書極博。……文盛堂冊肆人曾听謂余曰：“安南、琉球嘗買此書全帙以去，而以貴國之右文，尚未聞買此，誠為欠事。”其言實愧，遂強答曰：“此書不無冗雜者，如道家、釋家、雜家、術數等書，非儒者所可玩。經史、兵農、醫藥之書，我國已有之，不須此書。”曾頗然之。^⑤

雖然在中國人面前勉強爭回一點面子，但他內心深處不免有愧^⑥，所以在《燕行雜錄》中照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對明清文人別集的評論，大概多少也有彌補欠缺的意思吧。由於抄錄得較為完整，這對當時的朝鮮人瞭解明清人的文學創作，還是有一定幫助作用的。但

① 《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35頁。

②③④ 《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129、170、171—172頁。

⑤ 《燕行錄全集》，第81冊，第160—161頁。

⑥ 文盛堂書商曾听謂當時朝鮮尚未購買《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不足為據。《奎章總目·總目類》著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12冊，據考證，現存《奎章總目》為徐浩修撰，完成於朝鮮正祖五年（1781）。又，《大畜觀書目》亦著錄《四庫全書目錄》12冊，同樣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可證朝鮮王室藏書中已不止一套。又洪奭周於純祖十年（1810）編纂之《洪氏讀書錄》，乃就家中藏書擇要指導其弟閱讀之“推薦書目錄”，其中就列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可證在19世紀初，此書已進入朝鮮士大夫家庭藏書之列。所以，不可能到了道光年間朝鮮人尚未購買此書。曾氏之言，志在推銷，全無憑據，惜作者不能一辨。以上書目參見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1、2、8冊。

若誤以為是作者自身的評論，甚至以此推論這些明清人的文集在當時皆已傳入朝鮮，那就大謬不然了。

至於作者的雜抄部分，往往前後錯亂，無法貫通。以卷十三“日本”部分而言，雜抄《海槎東遊錄》及《海遊聞見雜錄》，前者為日記體，後者為紀事體，本書則隨意摘抄，混雜兩書。又卷十六“燕都記聞”，先是抄錄《宸垣識略》卷十五“識餘”部分，但自“貴州畢節縣”以下直到“明代諸儒文評”，大量篇幅記載者皆與燕都無關。

但也有該書記載與原本不合，卻值得重視者。最明顯的是卷十三日本部分的“關白世系”，其末云：“自良房至基實，相繼執政者二百餘年。基房以下，則不得干預國事，祇存關白之號而已，凡三十八世而絕。”^①此文出於南龍翼《聞見雜錄》，原本最後作“猶存關白之號，故並錄之，凡三十八世”^②。但原本所錄，自良房以下僅二十四世，而在該書中就有完整記錄，“基通”以下，“師忠”之前，可補列師家、兼實、良經、家實、道家、教實、兼經、良實、實經、兼平、基平、基忠、忠家、家經等十四世，正與“三十八世”相符。

關於此書的文獻來源，目前已大抵清楚，但還有少數條目尚待續考。例如，卷十三“燕行雜錄外編”題下註云：“此本得之於日本史記中，此本想必正本，故錄之，以便後考焉。”^③這已經非常明確地坦白是“抄錄”，但以下“日本世系”的內容仍不知所出；又，同上“日本傳”題下註云：“作者姓名失之未錄。”^④亦未能考得其來源。總之，雖說此書內容豐富，但抄襲的內容甚多，抄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也不在少數。因此，如果真正要參考這些相關資料，還是要根據原書。真正有價值的部分祇是作者自撰者，即“日記”三卷。

以上舉例說明朝鮮時代中國行紀文獻中的問題，希望能夠引起研究者的進一步注意，以避免一些離奇訛誤之發生。

三、研究方法的問題

高麗、朝鮮時代的中國行紀文獻屬於“域外漢籍”，對於域外漢籍的研究，我曾經試圖從方法上有所說明。^⑤這樣一個命題，既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補充、完善和修正，其學術意義也有必要繼續詮釋、闡發和推衍。

如果借用禪宗“隨病設方”^⑥的說法，提出一種研究方法自然是要有所針對的，是針對當今學術之“病”而施用的一味“藥”。關於東亞學術當今所面臨的問題，早就有學者提出了反省。

針對以費正清（J. K. Fairbank, 1907—1991）和列文森（J. R. Levenson, 1920—1969）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的主流觀點，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提出了“中國



《燕行錄》部分篇章

①③④ 《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18、243、260頁。

② 《海行總載》（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4）第3冊，第433頁。

⑤ 參見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中國文化》（秋季號，2009）；《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再談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文學遺產》2（2014）。

⑥ 此借用日本江戶時代僧人獨庵玄光語，見《獨庵玄光護法集·自警語》（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本）。其意蓋本於《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山僧說處，只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大藏經》，第49冊，第498頁）又，“山僧無一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大藏經》，第49冊，第500頁）。

中心取向”的轉型：“倘想正確理解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必需不僅把此段歷史視為外部勢力的產物，而且也應視之為帝制時代最後數百年出現的內部演變的產物。”^①他同時遺憾地指出：“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從而使西方史家無法在採用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觀點之外，另有可能採用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②針對“沒有中國的中國學”，日本學者溝口雄三（みぞぐちゆうぞう，1932—2010）提出了“作為方法的中國”，“想從中國的內部，結合中國實際來考察中國，並且想要發現一個和歐洲原理相對應的中國原理”。^③余英時則針對百年中國學術的狀況，提出了“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整體地看，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研究中所顯現的西方中心的取向是相當突出的。……今天是中國人文研究擺脫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發的時候了。……‘視西籍為神聖’的心態則必須代之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④而作為“再出發”的途徑之一，就是把目光重新投向東亞。

2012年6月，在臺北中研院主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大會上，王汎森在開幕式上作了“漢學研究的動向”的主題演講，分別從主題、史料、工具等三方面概述了21世紀以來的新發展，其中就主題而言，東亞成爲了一個新動向。我想要說的是，就這一主題來說，更重要的是顯現了研究方法的變化。

韓國以白樂晴（Paik Nak-chung）為代表的民族文學論，以及由《創作與批評》雜誌所主導的“東亞論”，雖然其內涵不限於學術，但僅就學術層面或者更縮小到文學批評與研究而言，其提倡的“立足於第三世界自我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本國文學、中國文學以及日本文學”，以改變東亞文學“祇在西方文學的邊緣彷徨”^⑤的現狀，即便是閱讀西方文學，也要“儘量用我們的耳朵聽聽他們所說的話，用我們自己的眼睛看看他們所看過的現實”^⑥，體現出的是在全球化時代，東亞的知識生產如何建立獨立的知識主體性，介入並逐步改變西方的知識生產體制的追求。

臺灣的陳光興在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 1908—1977）《作為方法的亞洲》和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其“亞洲作為方法”的主張，指出“亞洲作為方法的命題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一種積極的實踐，這種實踐最基本的就是將閱讀對象開始多元地擴向亞洲各地”^⑦。

日本學者靜永健（しずなが たけし）《中國學研究之新方法》對中國本土興起的“域外漢籍研究”予以高度評價，他指出：“即使是對本國文學研究得再深再透，如果不對同一時期同一文化圈中的周邊地域文化政治之連動予以關注的話，我想，我們的研究，最終還是擺脫不了陷入到一個夜郎自大、井蛙觀天的悲劇命運之中。……‘域外漢籍研究’並不是一門炫人耳目的奇學幻術，相反，它正是我們瞭解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一種‘王道’的研究方法論。”^⑧

以上略述“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提出的背景。作為這一方法的內涵，大致有以下幾

①② [美] 柯文：“中文版序言”，《在中國發現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林同奇譯，第3、1頁。

③ [日] 溝口雄三：《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李蘇平等譯，第94頁。

④ 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第295—297頁。

⑤ [韓] 白樂晴：“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分斷體制·民族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韓] 白永瑞、陳光興編，李旭淵翻譯校訂，第64頁。

⑥ [韓] 白樂晴：“如何看待現代文學”，《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金正浩、鄭仁甲譯，第227頁。

⑦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第405頁。

⑧ [日] 靜永健：“中國學研究之新方法”，《東方》348（2010）。

點：其一，將歷史上的漢字文獻當作一個整體。無論研究哪一類文獻，既要注重在空間上的不同地域（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也要注重與其他類別文獻的關係。總之，需要一種整體的眼光。其二，在漢文化圈內部，無論是文化轉移，還是觀念旅行，主要依賴書籍的流傳和閱讀。所以，要用“環流”的觀念看待書籍的閱讀或誤讀，探尋文化的借鑒和同化之途。其三，以人的內心體驗和精神世界為目標，打通中心與邊緣，將各地區的漢籍文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尋求其間的內在聯繫。其四，注重文化意義的闡釋，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時段上人們思想方式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一方面希望以此擺脫百年來處於西方學術籠罩之下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對百年來所受西方學術之恩惠報以適當的回饋。方法建立在個案研究基礎上，理論產生於與西方學術的對話中，最終形成一種獨立於而非孤立於西方學術的理論和方法。

就各國的行紀文獻而言，無論是朝鮮半島的朝天使、燕行使、通信使行紀，還是日本僧人的巡禮、參拜行紀，或是越南文臣的北使行紀，其中所提供的記錄是新鮮而生動的。這一方面可以讓讀者真切感觸到一幕幕歷史場景，但也有引導研究者墜入某個無關宏旨的片段的危險。因此，研究者更加需要漢文化圈的整體視野。在這樣一個框架中，研究任何一個具體問題，便可能形成如唐代船子和尚《撥棹歌》中所說的，是“一波纔動萬波隨”^①的狀態，研究者需要這樣的綜合研究。

最近二十年間，在歐美人文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恐怕要數“新文化史”了。它拋棄了“年鑒派史學”宏大敘事的方式，強調研究者用各種不同文化自身的詞語來看待和理解不同時代、不同國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中心論”的固定思路。以歐洲史研究為專業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列舉有關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研究，指出“當前一些最激動人心的文化史研究出現在邊界上”，“這些邊界上的研究工作給了我們其他人以靈感”；而“文化的碰撞和相互影響”，“應當成為新文化史的主要對象”；“借鑒和同化的過程不再是邊緣的，而是核心所在”。^②從21世紀以來世界漢學的動向看東亞和域外漢籍的研究，它們將成為“核心所在”的趨勢也十分明顯。但“新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其弊端，由於注重對歷史之樹的“樹葉”作研究對象，其最為人詬病之處，一是歷史研究的“碎片化”^③，二是因史料不足而帶來的過度詮釋。而“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提出，因為強調了整體視野，並力求破除中心與邊緣的界限，因而便於在揭示東亞各地區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克服“碎片化”，呈現其內在的統一性。

[作者註：本文得到韓國教育部2013年度項目資助，屬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振興規劃辦：KSPS）“海外韓國學教科研重點基地”項目成果（AKS-2013-OLU-2250003）。]

① 《船子和尚撥棹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7），第21頁。

② [英]彼得·伯克：“文化史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化史的風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豐華琴、劉豔譯，第227、233頁。

③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馬勝利譯。